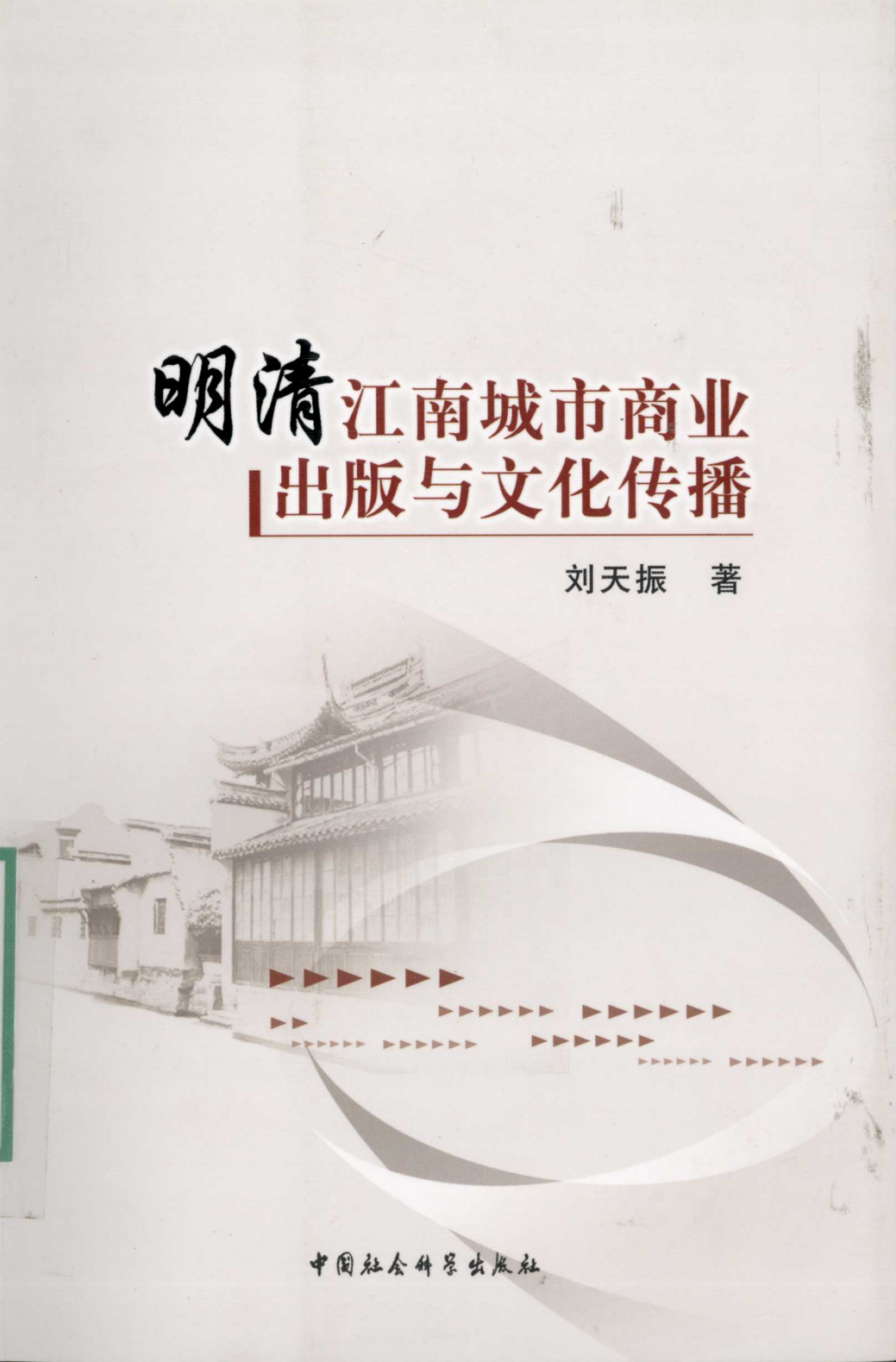


明清江南城市商业 出版与文化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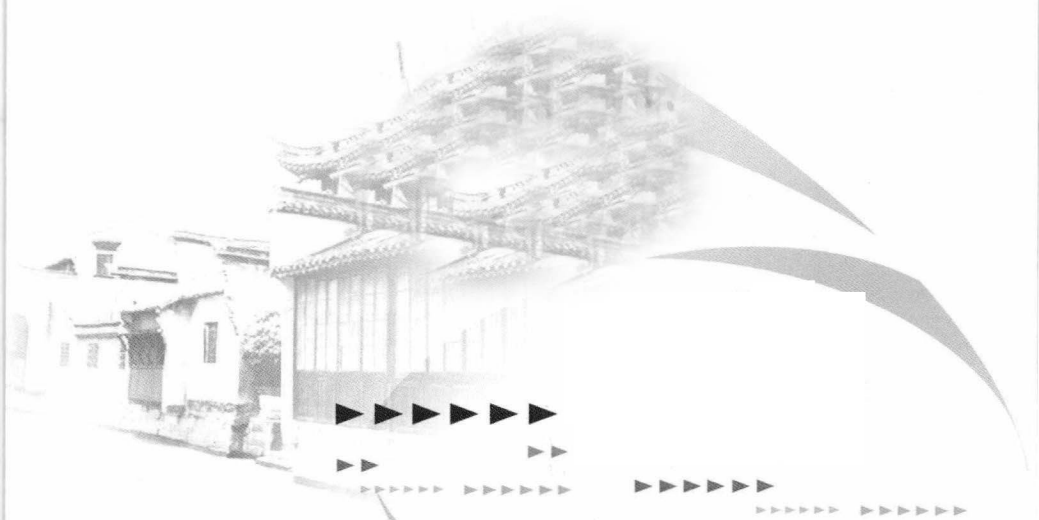
刘天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明清江南城市商业 出版与文化传播

刘天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 / 刘天振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004 - 9771 - 4

I. ①明… II. ①刘… III. ①出版事业 - 文化史 - 研究 - 华东地区 - 明清时代 IV. ①G23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5060 号

责任编辑 官京蕾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22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研究范围和撰写方式

关于出版史的学科内涵、研究范式，曾有学者指出：“简单说是考察书籍传播的历史演变。因此，出版史要求把书籍作为媒介工具来看待，这样才能完全区别于书籍史、版本学、目录学、刻书史、印刷史等相邻学科。研究明清出版，根据学科任务的要求，以明清时期书籍传播的现状与变革为中心，考察明清时期的作者新作如何问世，官民出版机构如何运作，书籍生产的技术与方式，书籍流通的渠道与过程，以及影响书籍出版的社会制度与方针政策等。评价历史现象的基本出发点是：是否有利于书籍传播的发展进步，是否有利于读者的接受与作者的创作。凡出版都是公众传播，不是公众传播就不是出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所有出版的共同之处。”^① 明清江南城市出版，尤其是书坊刻书，在稿源组织、编辑思想、题材选择、版式设计、刊刻发售、运作程序等方面，均体现出异于前代官、民刻书及当代官刻、私刻行为的特色。其彻底的商业化运作，推动了书籍传播方式的变革，培养了新的读者大众，并反作用于书籍的编创与生产环节。

关于明清江南城市出版的研究已有十分厚重的学术积淀，许多出版通史和断代史都曾将其作为研讨的重点，列有专门章节加以探讨。如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②一书，对明清时期南京、苏州、

① 刘光裕：《明清是中国古代出版的鼎盛时期》，《出版史料》2008年第3期。

②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杭州、徽州等江南城市官刻及民间出版机构的考订，对该地区印刷科技进步的论列，对刻书种类、特色的概括等，考证精审，见解精当。缪咏禾先生《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①一书，不仅对有明一代全国各地各类出版机构的刻书情况进行全面考述，而且对包括江南在内各出版中心刻书特色的论述高屋建瓴，独到精辟。杜信孚撰《明代版刻综录》^②，杜信孚、杜同书撰《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③，江澄波、杜信孚等撰《江苏刻书》^④，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⑤、邱澎生《明代苏州营利出版事业及其社会效应》^⑥、徐学林《徽州刻书》^⑦等著作，对明清江南出版的研究，或以扎实考证见长，或以独到论析取胜，为本领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区域出版史角度的研究，还有从刻书主体角度开展的分类型研究，如叶树声《明代南直隶江南地区私人刻书概述》^⑧、王桂平《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⑨、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⑩、沈冬丽《17世纪末—19世纪初苏州书坊刻书——以书业堂、扫叶山房为中心》^⑪、秦宗财《明清传统图书市场发展与徽州坊刻市场特色研究》^⑫、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⑬，等等，对明清江南私人刻书与书坊刻书的运行机制、传播功能等情况分别进行了深入探索。还有从出版物题材种类角度的研究，如通俗

①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年版。

③ 线装书局 2002 年版。

④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⑤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⑥ 载《九州学刊》5 卷 2 期，1992 年 10 月。

⑦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⑧ 载《文献》1987 年第 2 期。

⑨ 江苏凤凰出版社 2009 年版。

⑩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⑪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未刊稿。

⑫ 载《商业文化》2008 年第 33 期。

⑬ 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小说出版、戏曲剧本出版、商业书出版，等等，不再一一叙述。

传统的出版史研究一般依据出版主体性质分官刻、私刻、坊刻三种系统。明清江南出版也可从上述三种系统的维度展开讨论。众所周知，官刻、私刻系统是正经、正史以及文集的出版主力。官府刻书一般是经、史在先，子、集在后。子部特别是集部之书，数量多，又非官方之急，多靠民间刊刻。民间私刻多根据个人资源和所需所好，刻书品种呈现较强的个性化色彩，而不一定符合社会公众的阅读期待。因此，通俗的、实用的大众读物主要由民间书坊所刊刻，而书坊的生存与发展也依赖于读者大众的阅读兴趣。正如有的学者所论，在有明一代，开国之初，政治性和教化性读物在江南出版印刷业产品中占有很高比重。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的出版印刷业才发展了起来，而到了清代则已成为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流。这类商业化出版印刷业主要是印制销路广大的大众读物。^①

从出版性质而论，以民间书坊刻书的商业性最为突出，因此，本课题研究重点是与明清江南城市坊刻相关的问题。而即使明清江南坊刻的研究也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领域。明清江南坊刻的文献研究，已有十分扎实的基础。明清时胡应麟、谢肇淛、叶德辉等人的记载自不必说，当代学者张秀民、魏隐儒、缪咏禾、杜信孚等先生的探考也已积累下厚重的成果。他们的研究有的侧重于明清江南各城市出版机构、出版物数量的稽考普查，有的聚焦于各城市出版特色的概括论述等。这些成果都将是本课题开展工作的基础和起点。

关于明清江南出版商业化问题的研究，已有袁逸《明后期我国私人刻书业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活跃与表现》^②、范金民《明清

① 参阅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② 载《浙江学刊》1989年第3期。

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①、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②等论著，其中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对明清江南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出版进行了专门研究，视野开阔，资料翔实，其讨论的问题涉及明清江南官营与私营出版业的此消彼长、江南商业出版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印刷技术的多项进步、出版物的种类、出版产业的外向化特征，等等多个方面。其对大众出版物种类的总体观照，尤其别开生面，多有发明。

关于明清江南图书流通发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学界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③第十章《明代图书的经营、流通和收藏》对明代图书读者群体、图书市场、流通渠道、聚书之地等，均作了精深考论。陈学文《论明清时期江南图书流动市场》^④一文提出，明清江南“出现了专业图书市镇和乡村”。另外，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⑤一书、刘大军《中国古代图书发行体系》^⑥、《中国近代图书发行体系的剧变》^⑦、刘大军、喻爽爽《明清时期的图书发行概览》^⑧等论著，从发行渠道、发行方式、定价和付款、图书类型、图书发行宣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撷取的案例、列述的现象许多来自明清江南城市出版业。另外还有一些出版史、发行史著作论及明清江南图书发行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书坊刻书面向广大的基层民众，编辑思想全力迎合广大民众的多元需求，因而其选材范围很广，刻书种类很多。肖东发先生

① 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②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 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349页。

④ 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

⑤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 载《编辑学刊》1996年第4期。

⑦ 载《编辑学刊》1996年第5期。

⑧ 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

曾将建阳书坊所刻书籍分为三大类：“民间日用参考实用之书”、“科举应试之书”以及“通俗文学之书”^①，具体说来，包括：医书、类书、科举用书、状元策、翰林院馆课、八股文、小说戏曲等。这种分类方法对江南城市大众出版物研究也很有启发。

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一文集中探讨了明清江南书坊出版大众读物的盛况，他将该地区出版的大众读物分为六类：小说曲本等通俗文艺作品，通俗实用读物，童蒙课本，时文选本，宗教书籍，年画、日历及迷信用品。这种六分法应该受到肖东发上述三分法的影响，当然李氏又有所细化与扩充。这种六分法虽仍不免有些笼统和粗疏，但为后人的研究圈画下大致的畛域，初步梳理了内在结构，因此还是有其开拓性意义。不过，上述六类不能包容江南大众出版物的全部种类，譬如江南书坊编刊的杂志型读物就没有包括在内。实际上，上述六类中每一类都可以作为专门研究领域进行更深入探究。

李氏对明清江南出版的大众读物的概括分类，主要依据题材性质、编撰目的和受众群体等因素。大众读物即使当时出版数量巨大，因不受收藏家重视，保存量既是有限，而研究界对其开发的程度也极其薄弱，只有通俗小说和戏曲属于例外。从研究现状看，投入力量最多、开垦最为充分、成果最为丰硕的是通俗小说，其次是戏曲剧本。其余诸类大众读物基本处于尚未开发或者浅层次开发的状态。

以通俗小说研究而论，其研究的多面向趋势非常值得关注，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启迪：对其商业文化特性的研究，有陈大康《明代小说史》^②、苗怀明系列论文^③、蔺文锐《商业媒介

① 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下）》，《文献》1985年第1期。

②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③ 如苗怀明《明代短篇公案小说集的商业特性与文学品格》（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商业运作与文本形态》（载《求是学刊》2000年第5期）、《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出版中的伪盗之风》（载《社会科学》2000年第8期），等等。

与明代小说文本的大众化传播》^①、《情色诱惑：明代通俗小说读者的题材选择》^②等；对于明清通俗小说的传播研究，如潘建国系列论文^③、郭英德《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④、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⑤及其系列论文等；从书坊刊刻与通俗小说关系角度的研究，有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⑥、程国赋专著《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及其系列论文，等等；还有关于江南各城市小说出版特色的研究，如程国赋《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⑦、李忠明《明末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迁移与小说风格的转变》^⑧、戴健、李昌集《明下叶吴越刊刻中心与通俗小说》^⑨、汪燕岗《明代中晚期南京书坊和通俗小说》^⑩，等等，分别对南京、杭州、苏州等江南城市刊行通俗小说的情况进行了专门探讨，考察其数量、质量、版式风格等，揭橥其地域性特色。

如前所述，明清江南出版的文献研究，已有深厚的成果积淀，新的突破有赖文献的发现，而这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关于明清江南城市出版商业性问题的宏观研究，也已不乏有分量的成果，但在微观研究方面，如大众出版物分类研究，除了通俗小说和戏曲，则还有许多有待开垦的园地与空间。而通俗小说研究领域的多维视角与理路，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借鉴。因此，本课题不拟重复

① 载《戏曲艺术》2005年第2期。

② 载《戏曲艺术》2007年第2期。

③ 如潘建国《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等。

④ 载《求是学刊》1999年第2期。

⑤ 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⑥ 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2期。

⑦ 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⑧ 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⑨ 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

⑩ 载《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已有的成果，而是选取明清江南出版业开发的三种新兴读物：戏曲选本、杂志雏形和商业用书等作为考察研究的中心，对其成书方式、选材性质、编排体例、传播机制、受众群体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期通过全方位的个案观照，来透视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全貌之一斑。

众所周知，明清江南商业出版不是孤立绽放的出版文化花朵，也非独自运行的商品经济形态，而是与当时的官方出版政策、地域出版文化积淀，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文献资源储备、教育普及程度、社会士风民俗，乃至地理交通、商业环境等因素存在密切的关联。因此，我们的出版现象个案研究，不能离开上述背景因素，否则我们的叙述将变成空中楼阁、纸上花朵。

同时，江南与建阳是明清东南地区两大出版中心，两地在相互借鉴、资源共享的同时，其出版资源配置方式、出版物种类、选材旨趣、版式风格等，又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在讨论江南地区大众出版物话题时，会注意与建阳同类读物的对比，以凸显江南商业出版的地域性特色。

借用歌诀编辑资料、传播知识，是古代民间实用性读物最常采用的方式之一，也是古代大众文化形态最重要的传播手段之一。本书所讨论的明清江南三种通俗书籍，有两种程度不同地采用了这种编写方式。第四篇《明清江南商书出版与商业伦理传播》第四节《明清商书中交通地理之编写体例》对于明清江南商书中这种编写方式的运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和论述，但限于全书体例，未能充分展开，是故笔者把曾公开发表的《试论明代民间类书中歌诀的编辑功能》一文附录于全书之末，作为对此问题的深化论述，亦可补充一些背景资料。

目 录

第一篇 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发展的背景因素	(1)
第一节 出版史视野中的明清江南城市	(1)
第二节 明清江南商品经济发达,文化型社会形成	(3)
第三节 明清江南藏书之风盛行,文献积累雄厚	(6)
第四节 明清江南教育事业发达,文化普及率高	(15)
第五节 官方政策鼓励,刻书环境宽松	(20)
第六节 印刷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	(22)
第七节 印刷体之流行与定型,可以大批量复制书籍	(24)
第八节 书商、文人、刻工密切协作,结成生命 共同体	(26)
第九节 江南出版明清时达于极盛,各城市又绽放 不同特色	(30)
第二篇 明清江南曲本刊行及知识传播	(35)
第一节 明清江南城市曲选编刊概况	(38)
第二节 江西文人与建阳书坊合作编刊的曲选	(52)
第三节 江南戏曲选本的性质与功能	(59)
第四节 江南刊行的时调小曲集及表现功能	(60)
第五节 明清江南曲选编辑思想与选录标准	(65)
第六节 江南刊行曲选的商业文化底色	(69)

第七节	江南戏曲选本编辑体例及表现张力	(72)
第八节	江南与建阳两地所刊曲选旨趣之差异	(75)
第九节	明清戏曲选本传播的民间知识	(85)
第三篇	明清江南杂志雏形编刊与新型娱乐方式构建	(98)
第一节	明清江南杂志型读物的性质	(98)
第二节	江南杂志型读物兴起之背景及其义例之渊源	(100)
第三节	江南杂志型读物版本之存佚	(111)
第四节	杂志型读物编纂体例的复合性	(118)
第五节	江南杂志型读物的商业文化表征	(120)
第六节	金陵刊杂志型读物传播的知识系统	(125)
第七节	万历中期至明末建阳刊杂志型读物的 地域特色	(133)
第八节	杂志型读物在小说史及出版史上的意义	(139)
第四篇	明清江南商书出版与商业伦理传播	(142)
第一节	商人社会自觉与明清商书出版	(142)
第二节	商书选材范围与接受群体	(150)
第三节	明清商书与《事林广记》等日用类书之关系	(156)
第四节	明清商书中交通地理之编写体例	(166)
第五节	交通地理中的忧国情怀	(185)
第六节	明清商书中的民间生活伦理	(192)
第七节	明清商书中的历史知识书写	(207)
附录	试论明代民间类书中歌诀的编辑功能	(217)
参考文献	(229)

第一篇

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发展的背景因素

第一节 出版史视野中的明清江南城市

在明清区域经济史研究中，对于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向无共识。在众多研究者的论著中，“江南地区”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隅。李伯重先生曾依据两个标准对江南地区作出界定：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而在其内部，最好还属于同一水系，使其内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就明清时代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其合理范围应是今苏南浙北，即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这个范围，与本来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致相若。”他并补充：“上述八府一州在地理上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此八府一州的大部分地区，都同属一个水系——太湖水系。这一特点，使八府一州在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极为紧密。”^① 这种说

^①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法曾被许多学者接受。不过，这种划分方法将江南称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或“太湖水系”也许更为合适。因为，即使从经济地理角度讲，徽商集团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领域中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因此，将徽州府排斥于江南区域经济之外，是不够妥当的。

统观学界研究，大致而言，广义明清江南包括苏、松、常、镇、宁、徽、杭、嘉、湖九府，狭义明清江南则排除宁、徽二府，为七府。差异的形成主要由学者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目的所致。本书从明清江南出版业发展实际出发，尤其是鉴于明清出版网络中徽州地区与苏、宁、杭等地一直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徽州刻工、绘工转徙于苏、宁、杭各城市书坊，所到之处，其精湛技艺锐不可当，其书风、画风风靡江南各地。徽州府更有一些财势雄厚的盐商直接投资于苏、宁、杭等地的刻书业。因此，本书所称明清江南城市除了李伯重先生所说环太湖流域八府一州治所，还包括徽州府。

20世纪3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界在明清江南城市化进程研究方面，已经产生深厚的学术积淀，也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①，

^① 如范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马学强《从传统到现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日]森正夫等《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9年版），[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G. W.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美]琳达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Linda Cooke Johns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等等。

取得了许多学术共识。如最近 20 多年, 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成为城市化进程的热点。许多学者认为, 不仅苏州、杭州等州县治所可称城市, “明清江南大多数市镇当然应为城市地区”^①。明清江南,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育发展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外力推动, 城市关系加深渗入乡村, 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 “江南率先进入城市化的行列, 整个经济社会都在发生巨变”^②。出版业, 尤其是商业性出版业, 既是明清江南城市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更依赖于广大城镇读者群体的支撑。因此, 包括明清江南市镇史在内的城市研究成果是本课题展开叙述的背景和基础。

第二节 明清江南商品经济发达, 文化型社会形成

唐宋以来, 江南即为全国经济重地。韩愈说: “当今赋出于天下, 江南居十九。”^③ 苏轼也说: “两浙之富, 国用所恃。”^④ 宋室南渡, 迁都于杭州, 江南地区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宋灭亡, 政治中心虽然北移, 但江南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并未随之丧失。至明代, 其经济发展水平已为全国翘楚。丘濬说: “韩愈谓: 赋出天下, 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 浙东

① 冯贤亮:《史料与史学: 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学术月刊》2008 年第 1 期。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载《历史教学》1964 年第 5 期)一文即提出, 明清江南的市镇“已不是单纯恬静的乡村, 而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新型的小工商业城市”。后来的研究不过是在其开创的研究范式下的继续拓进。

② 陈学文:《略论明清江南城市化》,收入梅新林、陈国灿主编《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 页。

③ (唐)韩愈:《送陆歙州诗并序》,《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1 页。

④ (宋)苏轼:《进单镗吴中水利书状》,《苏轼文集》卷 32,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916—917 页。

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① 明朝江南相继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大都市。例如，明初南京人口曾达到百万^②，苏州则“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③。至晚明时期，江南商业经济达到极盛，出现了许多以粮食贸易及丝绸、棉花纺织、贸易著称的工商业市镇，为史家所羨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孕育于这一地区。明清鼎革，江南经济虽受重创，但很快恢复元气。清初绘制的《康熙南巡图》和《盛世滋生图》，形象展现了当时江南城市街衢四达、商贾云集、市廛繁荣的图景。

文化事业方面，宋代尤其是南宋以来，这一地区即为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诗人、学者群星闪耀，前后辉映。明清时期，这一地区无论是培育的文学家、艺术家，还是出版家、藏书家，其数量均在全国名列前茅。同时，这里又是全国科举最发达的地区。无论是贡献的进士数量还是巍科人物（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传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据统计，明清两朝全国共录取进士 51681 人，而江南六府一州共考取进士 6770 人，占全国总数的 13.10%。^④ 而巍科人物，明清两代全国共有 1008 名，江浙两省为 481 人，占全国总数的 49.50%^⑤，而且江浙两省的这些巍科人物，大多集中于江南地区的六府一州中。^⑥

①（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 2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史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 页。

③ 《康熙苏州府志》卷 54《遗事下》，清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④ 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2 期。范文中江南地区包含了江宁、镇江，共八府一州。这里的统计数据已剔除了江宁、镇江二府及常州府属的靖江、杭州府属的富阳、新城、临安、于潜、昌化六县的进士数。

⑤ 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教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⑥ 周明初：《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学流派综论》，《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1 期。

“山水之名腾布于词林艺苑中，是真湖山灵秀之气所发见者也。”^① 穆彰阿为吴县潘世恩《潘氏科名草》所作序有言：“盖闻文章之事关乎其人之学之养，而其所由极盛而不已者，则非尽其人之学之养为之，而山川风气为之也。江南乃古名胜之区，其分野则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则旁接乎闽越，而又襟长江而带大河，挺奇峰而出岷，故其灵异之气往往钟于人而发于文章。”^② 梁启超亦说：“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夹浙水之东西，实近代人文渊藪。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③

再从文学创作园地来看，宋元时期才开始产生的中国古代以地域命名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基本出现于南方地区，在明末清初才开始产生的自觉型地域性文学流派更是集中于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如元至明初出现的睦州诗派、浙东诗派、越诗派、吴诗派；明代中后期戏曲领域中诞生的越中派、吴中派、昆山派；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涌现许多自觉型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如云间派、虞山诗派、娄东诗派，还有柳洲词派、西陵词派、梅里词派、松陵词派、荆溪词派、梁溪词派等。^④ 这些争奇斗艳、各领风骚的文学流派，更为万紫千红的明清江南文化涂抹上了浓艳的华彩。

正如有的学者所论，江南在明清时代形成了一个以艺文为普遍表现、以图书为人文支点、以兴学为基础力量、以隐读为地域特色的文化型社会。这是江南自然地理、历史发展和人文化成的必然，是中国古代社会南方文明的极致形态，显示出明清江南的

^① 《重修常昭合志》卷32，光绪甲辰本。

^② 罗时进：《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的构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0页。

^④ 周明初：《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学流派综论》，《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